

公中之私 —— 關於家庭勞動 的國家話語(1949-1966)*

宋 少 鵬**

摘 要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集體主義時期，國家對於婦女的家內勞動並非完全「看不見」，而是努力對家務勞動進行理論化，以確立家務勞動及其承擔者在社會主義生產體制中的位置。在一九五、六〇年代，國家話語中存在著女工、農婦、職工家屬／家屬工三類不同的婦女。三個群體與生產的關係決定了國家對於她們家內勞動的不同態度，以及她們的政治地位。國家肯定職工家屬的家務勞動對於生產的間接貢獻，承認家務勞動是勞動，賦予家庭婦女「勞動者」的社會身份及其政治地位，並對模範家屬進行表彰。但是，國

* 感謝密西根大學的王政教授閱讀初稿，提出許多建設性的意見，啟發筆者進一步思考，並慷慨惠寄自己的大作，甚至未刊稿，深表感謝！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稿專家詳盡而中肯的修改意見，根據其建議，筆者調整了文章第四、第五部分的結構，並增補了相關內容，特此致謝！

** 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副教授

家所表彰的家屬家庭勞動的內容，經歷從家內家務勞動向家外生產勞動的轉變。農婦與女工因其在生產領域中的勞動，擁有明確的勞動者身份。農村婦女勞動力的定位是與婦女承擔家務勞動的角色密切聯繫在一起。在高積累低消費的生產體制下，應由集體承擔的責任被延遲，農村婦女卻因家內責任而在工分體制中成為二等勞動力。單位是城市女工再生產職責的首要承擔者，高積累低消費的發展策略造成生活用品和服務設施普遍供應不足，家庭成員的衣食等生活消費品基本上依靠女性的無酬勞動。單位所提供的部分福利遮蔽了女工／女職工在家內勞動方面事實上的負擔。在國家承諾與客觀需要之間的事實差距，被簡縮成女工／農婦個人需要克服的「特殊困難」。由此可見，在一個希望快速實現工業化的新興社會主義國家裡，為追求經濟超速發展而實行高積累低消費「以生產為中心」的發展策略，有意識地把性別化分工編織進大生產體制，由婦女無酬承擔起絕大部分的再生產職責。正因為對婦女家內責任的刻意保留，1990年代急劇市場化轉型時，國家從與再生產有關的福利中撤離並私人化這一領域時，鮮有遇到抵抗而順利地實施了市場化的經濟改革。但是，婦女的家內責任卻使工人階級婦女和中產階級婦女在勞動力市場處於不利的地位。

關鍵詞：家庭勞動、國家話語、公私相嵌型結構、集體主義、以生產為中心的發展策略

一、分析框架：以生產為中心的公私相嵌型結構

關於家務勞動的研究，女性主義學者一般會對貶低或無視於家務勞動價值的觀念和政策提出批評，把承認家務勞動價值，甚至「有酬化」家務勞動作為提升婦女地位的對策性方案之一。這種批評基本上是基於公私領域分離的視域，以資本主義社會的經驗為對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集體主義時期，¹ 曾經有過不一樣的歷史經驗。國家不僅承認和彰

¹ 在本文，把市場化轉型前的中國稱為集體主義時期，而不是毛澤東時代或計劃經

顯家庭勞動² 在社會主義生產中的作用，而且一度對於家庭勞動的承擔者——家屬——給予表彰和極高的政治榮譽。但是，對於婦女家內責任的刻意保留，不僅成爲集體主義時期婦女被大量動員進入生產領域之後承受雙重負擔的根源，同時，也是市場化轉型後婦女成爲「劣等」勞動力的原因。

中國婦女史專家賀蕭挑戰「中國例外論」，以西方女性主義理論中常用的公私領域的分析框架來呈現和解釋在集體生產時期農村婦女家內勞動「看不見」的情形及原因。當婦女的生產勞動比任何時期得到更多稱讚的同時，家庭作爲一個勞動場所事實上從國家話語中消失了，儘管婦女的家內勞動並沒有從日常生活實踐中消失。賀蕭基於她在陝西農村的訪談資料，尖銳地指出家內勞動的負擔使婦女在公共領域／生產領域的工分體系中變成一個低價值的勞動力。³ 這種負擔被認爲與生產無關而變得不可見。面對這種不平等，賀蕭發現婦女少有明顯地直接反抗。她認爲，婦女也認同男女之間差異的不可改變是造成婦女不反抗的緣故。

作爲一名具有理論造詣的歷史學家，賀蕭把 1950 年代農村家庭中婦女家務勞動的「看不見」，置於 20 世紀「革命中國」(revolutionary China) 的長歷史之中，試圖從理論上解釋爲什麼家庭作爲「私領域」在 20 世紀的現代性方案中註定被忽視的命運。賀蕭認爲，20 世紀初期革命者顛覆了家庭在傳統儒家秩序中的基礎性地位，以及清末變革者話語中的樞紐地位，致使家庭領域開始被視爲中國貧弱的原因和封建殘餘滯留的地方。儘管家庭領域需要變革，但已經不是中國革命的核心。毛澤東發表

濟，是因為筆者認爲集體主義是生產方式，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毛時代」的稱呼多少渲染著那個時代的極權特色。把一個時代的生產生活方式簡約爲某一領袖人物，似乎有欠公允，並貶低了作爲一種有別於資本主義生產生活方式的另類現代性的意義。計劃經濟，作爲市場經濟的對應詞，強調經濟的計劃性，特別是國家在經濟計畫中的主導性作用；但是，計劃經濟作爲一種經濟調節手段，無法呈現集體主義一詞所包含的生產生活方式的含義。

- 2 在集體主義時期，家庭勞動的範疇大於家務勞動，包括家內的家務勞動、家外互助型的社區服務、貼補家用的家外副業勞動。
- 3 通常情況下，男性全勞力掙 10 個工分，女性全勞力掙 7-8 個工分。

於1927年的「四條繩索」理論⁴是對公私領域重要性的重置，由政治和經濟權力構成的公共領域的變革，成為中國革命的核心和改造中國社會的關鍵，家庭領域成為公共領域變革的副產品。按照毛式婦女解放理論，政權的解放能自動帶來其它三條繩索的鬆動。1949年之後，國家主要也是彰顯政治領域中的男女平等。家庭領域在中國現代革命中地位的降低，賀蕭稱之為「理論上的忽略」(theoretical neglect)⁵。

本文的研究也印證了賀蕭對於農村婦女勞動的觀察，筆者贊成運用公／私這對現代性的概念來分析長時段的「革命中國」或是短時段的集體主義時期中國的家內勞動。之所以贊成公私作為分析框架，是因為筆者認為現代中國社會的重大轉型都是著力於公私領域的結構性重整。近代，教育國民樹立公私以及國家和社會（「群」）是公共的觀念，⁶是現代中國國家建設的一部分；集體主義時期大公無私的教育，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道德基礎；而當下大陸社會經濟體制的市場化轉型更是以公私領域的重構為基礎。⁷但是，公／私概念作為理論分析工具，需要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下具體化。公／私框架並非只有一種二元分離的對抗性結構，也可能存在其它多樣的結構形態。同一種結構形態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下，公私界線有可能發生流動性的挪移，甚至最終發生結構性質變。賀蕭在其文章的論述結構上，採用「公領域／看得見」來對應和比較「家庭領域／

4 四條繩索指壓迫中國婦女的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前三種壓迫是女人與男人共有的。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卷1，頁31-34。

5 Gail Hershatter, "Making the Visible Invisible: The Fate of 'The Privat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收入呂芳上編，《無聲之聲(I): 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1600-195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257-279。

6 清末公德與私德之爭參見：陳永森，〈清末知識份子對公德和私德的思考〉，收入劉澤華、張榮明等著，《公私觀念與中國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203-217。

7 筆者認為大陸的市場化改革是通過兩種私化實現的，一種是所有制的私有化，一種是家庭的私人化。後者把與人的再生產相關的責任推給家庭，從而減少了企業成本，同時也使勞動階級和城市的中產階級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處於不利地位。參見：宋少鵬，〈「回家」還是「被回家？」：市場化過程中「婦女回家」討論與意識形態轉型〉，《婦女研究論叢》，期4（2011年7月），頁5-12。

看不見」，儘管以「私領域的命運」作為題目，以私領域來指稱家庭領域，但她仍謹慎地似乎有所保留地把私領域用引號括了起來。對於家庭在何種意義上成為「私領域」，以及私領域與公領域之間的關係，賀蕭沒有給出明確地解釋。

本文的工作：第一，在研究對象上，把家屬／家屬工、城市（全民）女工、和農婦三個群體一起納入到家庭勞動的研究視域內，構勒出五、六〇年代國家對於家庭勞動態度的整體圖景及其變化的軌跡。在五、六〇年代的國家話語中，存在著女工、農婦、家屬／家屬工三類不同的婦女。婦女與生產的關係，決定了國家對於這三個群體的家內勞動的不同態度，以及她們的政治地位。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下，國家態度有所變化和側重。三者的家內勞動在國家話語中的能見度，家屬最強、農婦次之，女工最低。賀蕭的研究認為，集體主義時期農村婦女家內勞動的「看不見」造成了農村婦女家內勞動和家外勞動的雙重負擔。據筆者閱讀所及的材料判斷，國家對於農婦的家務勞動並非完全視而不見。反之，特別是婦聯領袖，在承認婦女家內責任的前提下，試圖呼籲合作社注意合理安排婦女勞動力。但是，對於婦女勞動力的定位與婦女承擔家務勞動的角色的密切聯繫，卻使婦女成為工分體系中的二等勞動力。城市家庭婦女，特別是職工家屬的家內勞動，在五、六〇年代的國家話語中不僅可見，家屬更是一個明確的政治主體。但隨著國家動員婦女參加生產勞動的意願的增強，家屬的家內勞動在國家話語中日益消退，其家外的生產勞動日益受國家的肯定和彰顯。相比於國家對家屬的家內勞動的承認和表彰，城市女工的家務勞動在國家話語中的能見度最低。理論上，與人的再生產相關的責任是單位／國家的責任；在實踐上，女工的家內負擔卻被視為婦女個人的「特殊困難」。簡言之，在集體主義初期，以婦聯為代表的國家話語對於婦女的家內勞動並非完全「看不見」，而是努力對家務勞動進行理論化，以確立家務勞動及其承擔者在社會主義生產體制中的位置。本文以《人民日報》、《工人日報》、《中國婦女》雜誌、全國婦聯領導人的官方講話為基本研究材料，輔之於對鞍山鋼鐵公司和大慶油田一些已退休家屬工的訪談，及鞍鋼工會檔案，梳理五、六〇年

代關於家庭勞動的國家話語的變化過程，並試圖對產生這種變化的原因作出解釋。

第二，在理論框架上，筆者認為集體主義社會同樣存在公／私結構，但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公私二元分離的架構。在集體主義的不同時期，其結構也不同，公私界線是流動的。家庭作為「私領域」嵌入在「公領域」之中，成為公領域的組成部分，本文稱這種結構為公私相嵌型結構。資本主義社會中，公私領域相分離並相互對抗，本文稱這種結構為公私分離型結構。⁸ 在公私相嵌型結構中，私領域（個人／家庭）嵌入於公領域（共同體）⁹ 之中，「公」與「私」的利益和目標並不衝突，反而是合一的，「私」的價值體現於「公」的價值的實現之中。私領域因其對公領域的作用和功能有可能被彰顯，同時也存在另一種可能性，作為公領域一部分的私領域完全淹沒在公領域之中。公私相嵌的結構中，邏輯上，公領域在道義上具有更高的德性，因為公共利益的實現同時也意味著私領域利益的實現。¹⁰ 當然，公私分離型的結構同樣存在公私領域的價值等級，如，自由主義者會賦予私領域以更高的德性，而社群主義者會賦予公領域更高的德性。另外，公私相嵌型的結構也不同于家國同構的儒家秩序。¹¹ 家國同構，家是國的基礎，是秩序的塔基，但家國之

8 公私分離型結構裡，何為「私領域」和何為「公領域」也是有爭議的。政治屬於公領域，家庭屬於私領域是基本共識，分歧在於市場、市民社會等第三領域是作為公領域還是私領域。參見：安德魯·海伍德(Andrew Heywood)著，張立鵬譯，《政治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頁10。

9 共同體可以是單位、社區、階級、國家等各類人群規模不等的共同體。

10 在中國大陸，從孩童時期就會接受一種集體主義教育：就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個人、集體、國家三者利益是一致的。這種共同體意識／集體主義精神是以公私相嵌型結構為邏輯基礎的。

11 王政教授在閱讀本文初稿時，提出公私相嵌型結構是調用家國同構的傳統文化資源，是一種共產主義理想的「本土化」表現。集體主義時期「小家」與「大家」的提法，正是體現了中國傳統思想資源的運作。在「革命大家庭」中，個人有被「大家庭」照顧的權利，這是延續並體制化傳統親屬倫理。這一觀點深具啟發性。筆者不否認集體主義的意識形態對於儒家家族文化資源的挪用、雜揉甚至創造性的轉化，但在此文中，筆者還是想強調兩者的本質區別：第一，平等觀取代等級觀；第二，公領域獲得了優位性；第三，公私之間界線的虛化。

間的界線是清晰和必要的，比如親親尊尊的討論、子為父隱的倫理，國家權力並不會完全干預宗族內的家長權力。在公私相嵌的結構中，家庭失去了基石性的作用，不再是承載德性的秩序基礎，¹² 只是為完成公共目標而起輔助作用的一個功能性、工具性的社會組織。公私之間的界線是虛化的，「公」隨時可以穿越這種界線，而非僅是界線的移動（界線的移動需保留兩個領域的相對獨立性），直至完全吞沒「私」。理論上，公私相嵌型社會結構的存在要以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作為物質保證，以確保作為共同體的公共利益的存在，還需要共同體成員具有「公德」和集體主義精神，所以，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公民教育是社會秩序必備的精神基礎。

第三，在研究路徑上，本文希望超越文化史研究路徑，對公私領域的理解回歸到政治經濟學路徑。文化史研究理解集體主義時期公私領域重構對於婦女勞動的不同意義、婦女個人生活的影響、以及呈現婦女的主體性有著重要作用。但是，從文化視角來追問為什麼中共政權刻意保留性別化的勞動分工，延遲了對家庭內性別關係的變革？答案基本上就會滑向「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背叛婦女，背棄了婦女解放」。最終只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中共政權，卻失落了對於現代性社會政經體制、對於「以生產為中心」的現代人類發展方式更宏大的批判。現代社會組織大生產需要對物的生產和人的再生產做出安排，公／私領域正是實現生產／再生產兩種職能的場域。社會主義生產體制和資本主義生產體制都是現代性大生產體制，前者以公有制為基礎，後者以私有制為基礎。前者生產的動力是為共同體（包括「我」在內）謀求共同和長遠的利益（包括代際利益）；後者生產的動力是為資本謀利。兩者最本質的區別在於分配領域，馬克思認為剝削的實質就是資本對於工人勞動的無償佔有。在生產領域，資本主義生產體制和社會主義生產體制在組織生產過程、以及安排生產和再生產方面曾提供過截然不同的兩種方案，產生兩種不

12 比如，兒童教養被認為應以社會教養為主、家庭教養為輔。參見：〈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 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收入《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8），頁 399。

同的公私領域結構。在中國大陸曾經實踐過的社會主義生產體制，試圖把生產和再生產兩個領域結合起來，表現為公私相嵌型結構。安排好職工生活是生產組織者的責任。私領域中的一切問題，家務勞動、家庭生活、甚至夫妻關係等都被看作影響生產的因素。通過安排好職工生活，提高職工的主人翁意識，調動職工的生產積極性，最終促進企業的生產效率。¹³ 在「以生產為中心」的公私相嵌型的結構裡，私領域註定處於輔助地位，也為「公」干預「私」提供了正當性，但並不必然造成私領域的隱遁。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體制下，生產和再生產兩個領域相分割，表現為公私分離型結構，資本／企業對於再生產不承擔直接責任，通過把再生產職能私人化，減少企業的生產成本和社會責任，實現資本利潤的最大化。到目前為止，人類社會實踐過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現代性的大生產體制，雖由不同結構的公私領域支撐，卻分享著一個共同的現代性目標：以生產為中心，追求生產效率為目標。¹⁴ 為實現這個目標，兩種生產體制還分享了一個共通的作法：把絕大部分再生產的職能¹⁵ 留給家庭，事實上由婦女來承擔。區別在於，在不同的公私結構下家務勞動有著不同的意義。但是，在「以生產為中心」的社會體制下，不管是社會主義生產體制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體制，婦女的家內責任使婦女

-
- 13 在集體主義時期，幹部不關心職工生活會被批評為官僚主義。企業職工的生活主要由工會負責，其主要的職責是調查職工的生活狀況、解決職工生活困難、安排職工業餘生活；女工的勞動保護也歸工會負責。恰是在大躍進時期，明確要求黨委負起「抓生活」的責任，所謂「一手抓生產，一手抓生活」。需要強調的是，生產生活一起抓貫穿於整個集體主義時期，「抓生活」不只是工人的福利問題，也是「抓生產關係的問題」，當然，最終目的是為「抓生產」服務，終究逃不出「以生產為中心」。參見：〈一手抓生產，一手抓生活〉，《人民日報》，1960年11月17日，版3。
 - 14 大陸推行市場化改革時，官方對於計劃經濟最主要的批判是其「無效率」。而毛澤東時代的支持者，同樣會援引集體主義時期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來正當化「毛時代」。觀其背後的現代性目標實質上是一致的。
 - 15 再生產領域的職能可以在生產單位內實現，比如生產單位內的食堂、宿舍、澡堂、托兒所等。不管是資本主義生產體制還是社會主義生產體制，都有類似的機構安排。任焰、潘毅，〈宿舍勞動體制：勞動控制與抗爭的另類空間〉，《開放時代》，期3（2006年6月），頁124-135。

在生產領域中成爲二等勞動力，從而也使婦女在其他社會領域中處於不利地位。

二、家庭婦女：從「寄生蟲」到「工人階級一部分」

1950年代儘管女工和女職工的數量有了長足的進展，但是仍可以斷定的是絕大多數的城鎮女性是家庭婦女。雖然沒有精確的統計資料可以準確計算出五、六〇年代到底有多少家庭婦女，但仍可根據大陸唯一收錄改革開放前有關女性資料的書籍《中國婦女統計資料 1949-1989》做合理地推測。1949年在全民所有制各部門就業的女職工只有60萬人。以有城鎮人口統計資料的1953年爲例，1953年末全民所有制各部門中女職工人數爲213.2萬人，城鎮女性人口是3,234.2569萬，¹⁶在全民企業就業的女性人口大約只占到城鎮女性人口數的6.59%。儘管除了全民所有制企業之外，還有一些女性在其他性質的勞動部門從事家庭外的生產，但五〇年代絕大多數城市婦女是家庭婦女，應是確鑿無疑的。

要理解五、六〇年代國家對於家庭勞動的定位和家庭婦女的政治地位，必須理解勞動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多重意義。第一，生產勞動創造歷史。非勞動者意味著應該被歷史拋棄。第二，勞動是一種公民資格。就國家性質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是勞動者的國家，勞動涉及到國家的性質和政權的正當性；對於公民而言，勞動者的身份不僅僅是經濟身份，更是一種政治身份。第三，勞動是一種道德。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只是一種經濟理論也是一種道德理論。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勞動是一種道德律令。1950年的五一勞動節，劉少奇發表講話稱「我們必須給勞動者，特別是在勞動事業中有重大發明和創造的勞動英雄們和發明家們以應得的光榮，而給那些無所事事、不勞而食的社會寄生蟲以應得的賤視。這就是

16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研究所、陝西省婦女聯合會研究室主編，《中國婦女統計資料 1949-198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1），頁29、239。

我們的新道德的標準之一」。¹⁷ 對勞動模範的表彰不僅是對其經濟貢獻的肯定，更是政治肯定和道德肯定。第四，在最低層次上，勞動才是一種經濟行爲，是一種謀生的手段。

何種形式的工作屬於「勞動」的範疇，以及不同形式的勞動¹⁸ 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決定了勞動者在國家中的政治地位。家務勞動能否成爲一種勞動、得到國家的承認，決定家庭婦女能否獲得勞動者的身份並擁有政治地位。按照生產勞動創造歷史的思想，參加家庭外社會生產的婦女——不管是城市中女工，還是農村中的農婦，她們擁有和男性一樣無可爭議的勞動者身份，憑此也獲得了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但若以生產領域中的勞動作爲標準來衡量，那麼，家務勞動的價值以及家庭婦女的社會地位就會遭到貶斥。事實上，在中共建國初期確實如此。家庭婦女被視爲「寄生蟲」，這對於家庭婦女既是政治否定也是一種巨大的道德壓力。1949年和1952年《人民日報》都發表過家庭主婦的來信，要求擺脫「可恥」的「寄生式生活」，¹⁹ 國家充當了拯救者的角色。²⁰ 婦女走出家庭參加工作，是新政權下婦女解放的象徵。1952年8月4日政務院發佈《關於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城市廣大家庭婦女——特別是具有相當文化程度的知識婦女，被看成需要解決就業

17 劉少奇，〈在北京慶祝五一勞動節幹部大會上的演說〉，《人民日報》，1950年5月1日，版1。

18 比如，對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在歷史進程中不同作用的定位決定了工農階級與知識份子政治地位的差異。五、六〇年代強調「（體力）勞動創造歷史」，勞動階級的政治地位高於知識份子，體力勞動者的定級工資高於普通機關人員。經濟改革之後，科學技術被視爲第一生產力、管理產生效率，工人的體力勞動不再視爲財富的最終來源。知識份子的地位從「臭老九」上升爲「第一生產力」，產業工人被汙名爲需要不斷提高自身「素質」以適應現代體制者，「能力低」不僅成爲下崗理由，更是工人經濟收入和政治地位下降的原因。

19 何萍，〈組織家庭知識婦女 參加各種生產勞動——對黃飄問題和變消費城市爲生產城市的意見〉，《人民日報》，1949年4月10日，版4；薛澤暉，〈決心做一個人民勤務員〉，《人民日報》，1952年8月17日，版2。

20 靜，〈人民政府爲我們家庭婦女想得真周到〉；家庭婦女沈子成、李錦等，〈期待著政務院勞動就業委員會開展工作〉，《人民日報》，1952年8月15日（讀者來信），版2。

問題的城市剩餘勞動力。《決定》發佈當天配發的《人民日報》社論〈有計劃有步驟地實現全面的勞動就業〉把家庭婦女作為實施全面就業的對象。《決定》頒佈後不久，《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封署名鐘碧林的家庭婦女的來信，表達了家庭婦女對《決定》的歡迎和感恩：

結了婚，一直做著「賢妻良母」，當「寄生蟲」。解放前不敢想到自己有什麼真正獨立的人格，被人歧視、鄙棄時，也只有忍受。……在新社會的教育下，我開始認識到我生活著不應該只為了一個家庭，而應該為了更多的人，於是我決心走出家庭。……上班了感到在大家庭的這種愉快是在小家庭找不到的。²¹

「小家庭」和「大家庭」的說法，呈現出中共建國初期開始塑造的公私觀念，以及為動員家庭婦女走出家庭時所調用的集體主義的意識形態。

在生產勞動創造歷史的觀念鼓勵下，城市政權建立伊始，國家就提出把消費城市改造成生產城市。²² 1949年召開的中國婦女第一次代表大會，也把城市婦女運動的方針確立為「發動和組織婦女參加生產為中心」。²³ 認為「婦女只有參加了生產，成為社會和家庭財富的創造者，才能真正實現政府規定的各項男女平等的法令，才能真正享受男女平等的各項權利」。²⁴ 1949到1952年期間，《人民日報》所代表的國家態度明顯傾向於認同家庭婦女是「寄生蟲」的說法，以推動家庭婦女走出家庭從事社會生產勞動。1950年的三八節，宋慶齡發表文章號召家庭婦女參加生產建設，把家務勞動定性為「家庭的瑣屑事物」，是造成婦女「束縛著、窒息著，使她們變為愚蠢和保守」的原因。²⁵ 1949年，上海

21 鐘碧林，〈家庭婦女鍾碧林勞動就業了〉，《人民日報》，1952年9月4日（讀者來信），版2。

22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年3月5日），《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卷4，頁1428。

23 鄧穎超，〈中國婦女運動當前的方針任務報告〉，收入《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頁7。

24 鄧穎超，〈關於城市婦女工作的幾個問題〉，收入《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頁70。

25 宋慶齡，〈「三八」紀念與家庭婦女生產建設〉，收入《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

市婦聯爲了把上海 100 多萬的家庭婦女納入自己的工作對象，對家庭婦女的階級性質進行重新定義，認爲絕大多數家庭婦女是底層勞動婦女，她們的家庭勞動，雖「對社會生產不重要」，但也並非是「純粹的社會消費者」。婦聯組織家庭婦女的目的是要把她們「從附屬的地位解放出來從事社會的生產勞動。目前的目的是使廣大家庭婦女在思想上和技能上有準備。使社會上產生大量的生產後備軍」。²⁶

中共建國初期，讓所有城市家庭婦女全部就業的理想目標幾乎是不可能實現。一則沒有那麼多的工作崗位，二則婦女出來工作之後，國家馬上面臨兒童公共養育的巨大負擔，這對於剛建國的新政權甚至是無法承受的。在 1952 年貫徹政務院《關於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積極推動家庭婦女就業時，婦聯已經意識到理想與實踐之間的矛盾，謹慎地提出「宣傳勞動就業中要極力防止輕視家庭勞動的情緒，要有意識地說明家庭勞動的意義，使不能和暫時不必就業的家庭婦女安於家庭勞動」。²⁷

生產單位也很快意識到，男性職工在生產一線的工作效率離不開職工妻子在家庭內的精心照料和沒有家事拖累。1951 年總工會與全國民主婦聯協商確立各自的工作範圍：集中居住的職工家屬工作主要由工會負責，散居職工家屬工作主要由婦聯負責。²⁸ 同年 10 月 10 日全國總工會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工人、職員家屬工作會議。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李立三要求工會組織必須明確家屬工作是工會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求各級工會組織研究進行家屬工作的辦法和步驟，加強對家屬工作的領導。²⁹ 這種管理隸屬的安排，體現了生產部門已意識到職工家屬的家務勞動對於企業生產的重要性。1951 年由民主婦聯、全國總工會等聯合下

編》，頁 59。

26 Wang Zheng, "'State Feminism'? Gender and Socialist State Formation in Maoist China," *Feminist Studies* (Fall 2005), pp. 519-551.

27 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為協助執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給各級婦聯的通知〉，《人民日報》，1952 年 8 月 10 日，版 2。

28 中華全國總工會、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關於女工及職工家屬工作領導關係的聯合通知〉，收入《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頁 95。

29 〈中華全國總工會召開全國職工家屬工作會議，決定加強職工家屬工作〉，《人民日報》，1951 年 11 月 14 日，版 2。

發了 34 條「三八節」的宣傳口號，其中有專門針對職工家屬的口號：「職工家屬們，要搞好家務，協助職工完成生產任務！」。³⁰ 在集體主義的生產體制中，生產和再生產的結合也體現在空間安排上，生產單位有意識地把職工家屬組織起來，集中居住，讓生活區靠近生產區，³¹ 以「方便生活、有利生產」。1951 年末，集中居住的產業工人的職工家屬，有 160 多萬人，比 1950 年增加了 570%。其中僅 7 個省，23 個市和 7 個礦區的統計，已建立了 2,151 個家屬委員會，13,787 個家屬小組。³² 1953 年，在工礦企業中集中居住的職工家屬增長到 190 多萬人。³³ 1954 年達到 235 萬人。³⁴ 1956 年底，集中居住的職工家屬中，建立了 11,389 個家屬委員會，組織起來的家屬約有 1,517,957 戶，有 4,387,997 人。³⁵

1953 年 4 月召開的中國婦女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重申第一次婦代會確立的「以生產為中心」的工作方針，同時，全國民主婦聯從有利於生產的角度出發，肯定家務勞動的必要性。「教育一切孩子的母親，帶好孩子，正確地教育孩子，使之成為身心健康的兒童，這是一切母親的光榮職責」；號召職工家屬以「愛護職工、鼓勵職工搞好生產做為當前的光榮任務」。³⁶ 鄧穎超在 1954 年的「三八」節講話中，肯定廣大職工

30 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等，〈關於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的通知〉，收入《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頁 87。

31 進入 21 世紀以來，到處可以看到一些傳統老工業區中家屬區的拆遷，生活區和生產區在空間上的分離，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國企改革對公私領域的重構。90 年代中期，國家實行「企業不再辦社會」的改革，與再生產有關的職能視為與生產無關，要求從企業中剝離出來。這一過程與女工下崗幾乎是同步的，可以看出再生產職能推入家庭對於女工的影響。

32 〈中華全國總工會召開全國職工家屬工作會議，決定加強職工家屬工作〉，《人民日報》，1951 年 11 月 14 日，版 2。

33 〈各地廠礦企業職工家屬督促職工遵守勞動紀律搞好生產〉，《工人日報》，1953 年 8 月 15 日，版 2。

34 〈全國二百多萬組織起來的職工家屬 成為支援工業生產的重要力量〉，《人民日報》，1954 年 3 月 7 日，版 2。

35 楊之華，〈勤儉建國 勤儉持家 為社會主義建設更大的力量〉（在全國職工家屬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摘要），《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5 日，版 3。

36 鄧穎超，〈四年來中國婦女運動的基本總結和今後任務〉，收入《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頁 176。

家屬「團結互助、搞好家務」，提出「增進職工身體健康，鼓勵職工按時上工，減少缺勤，使他們精神飽滿地參加生產；這對職工完成並超額完成工礦企業的生產計畫已表現了重要的作用」，並承認為「生產服務」的家務勞動也是為「社會主義工業建設服務」。³⁷ 1957年6月蔡暢在第一次全國職工家屬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可以說是婦聯對於家務勞動及其與婦女解放的關係所做的一次最系統的理論闡釋。這次講話不僅是對以前婦聯領導人關於家務勞動的系統總結，也是回應1956年下半年國家宣佈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婦聯幹部對於婦女解放問題的一些理論困惑。³⁸ 蔡暢特別回答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家務勞動的意義，與家庭婦女解放的方向。首先，「以一切對社會主義事業有益的勞動都是光榮的」為標準，承認和肯定職工家屬的家務勞動是「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一種勞動，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所必需的勞動，因此也是光榮的勞動」。接著，她對家務勞動、社會勞動、生產勞動作出了區分：

說得寬一些，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切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勞動，都是社會勞動；所以家務勞動，也是社會勞動的一部分。說得窄一些，所謂社會勞動，就是在家庭以外的集體生產事業或者福利事業中的勞動。從這個意義上說，脫離家庭，和職工們一樣地參加廠礦企業中的生產勞動，叫做參加社會勞動；不脫離家庭，而是家屬們在家務勞動之餘，組織起來，團結互助，搞副業生產，辦幼兒園、辦托兒站，以至於辦小學等等，也叫做社會勞動。³⁹

通過對不同類型勞動的區分和排序，首先，肯定家務勞動是勞動，承認家務勞動一定程度上具有社會性，從而構築了家務勞動和職工家屬

37 鄧穎超，〈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在首都各界婦女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大會上的講話〉（1954），收入《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頁189。

38 〈全國婦聯婦女幹部學校部分學員對婦女解放問題的看法〉，收入《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頁294。

39 蔡暢，〈搞好家務勞動 支援國家建設〉（全國職工家屬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57年6月13日，版4。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的正當性；第二，確立勞動⁴⁰的等級序列，家務勞動處於這個等級的末端，生產勞動是這個等級的頂端，介於兩者之間的社區內的社會勞動是中間階段。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與其所參與的勞動等級成正比。這就為家庭婦女追求解放提供了明確的路線圖。在社會主義的現階段，家務勞動雖具有社會性，卻不是婦女解放的終極目標。終級目標是參加社會生產勞動，這與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是可以相容的。在這個路線圖下，蔡暢鼓勵職工家屬們「不但有搞好自己的家務勞動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責任，同時也有在可能條件下，積極地參加社會勞動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責任。」鼓勵職工家屬們在「家務勞動之餘，組織起來，團結互助，搞副業生產，辦幼兒園、辦托兒站，以至於辦小學等等」。

事實上，在1957年之前，婦聯領導人在不斷肯定家務勞動的貢獻和作用的同時，從未否認過家庭婦女在條件成熟的將來走出家庭參加生產勞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現階段之所以仍然需要婦女從事家務勞動，是因為「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幼兒園、托兒所還不可能普遍建立之前，還需要一定的勞動力來操作家務」。⁴¹為此，不斷地教育職工家屬要一顆紅心，兩手準備，隨時等待國家的召喚，須「搞好家務，並加強學習，提高政治、文化水準，準備好條件，以備祖國需要時，隨時參加祖國的各項建設任務」，⁴²以及「家庭需要我的時候，就以家務勞動為己任；祖國需要我擔負其它職務的時候，就堅決地擔負起祖國交給我的工作」。⁴³在

40 在集體主義時期，「勞動」、「生產」、「工作」三個詞有著微妙的差異。賀蕭指出「工作」是指有酬勞動，「勞動」在農業生產是指田間勞動和副業勞動，而不使用在家務中。根據本文的研究，筆者認為家務勞動是被稱為「勞動」的，但不被稱作「生產」。「生產」專用於指稱工農業大生產，「生產」的概念是與歷史進步和社會發展聯繫在一起的。所以，要理解集體主義時期的家務勞動，除了要理解「有酬」和「無酬」所帶來的不同的社會意義之外，關鍵要區分「生產」與「勞動」。

41 章蘊，〈國家過渡時期城市婦女工作的任務和當前的幾項具體工作〉，《人民日報》，1955年9月7日，版3。

42 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關於今後全國婦女運動任務的決議〉(1953)；鄧穎超，〈四年來中國婦女運動的基本總結和今年任務〉(1953)，收入《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頁179、176。

43 章蘊，〈國家過渡時期城市婦女工作的任務和當前的幾項具體工作〉，《人民日報》，1955年9月7日，版3。

中共婦女領袖的婦女解放理想圖景中，婦女專職從事家務勞動，只是在特定歷史階段受社會經濟條件所限時的暫時性處境，未來婦女解放仍是以婦女大量進入社會，參加社會勞動為目標。正是在這樣一種勞動等級序列和婦女解放路線圖下，當生產勞動的需要擠壓家務勞動時，即，公領域的需要擠壓私領域時，婦聯除了鼓勵婦女群眾以革命意志加以克服和等待國家兌現家務勞動社會化的承諾之外，無法再對家務勞動保持支持的態度，這是國家話語中家務勞動消失的理論原因。

1957年的全國職工家屬代表大會，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的賴若愚把職工家屬定位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⁴⁴之前，一般只提女工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三個月後，第三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召開，賴若愚的致詞和章蘊的工作報告都重申職工家屬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提法。⁴⁵把職工與家屬之間關係定位為「共同建設社會主義新生活的同志關係」，而「不僅是親人關係」。⁴⁶但同時，賴若愚把家屬的家務勞動與職工的生產勞動比喻為前線與後方，⁴⁷所以，雖為「同志」，工作同樣重要和光榮，但是家務勞動註定其配合、支援輔助的性質。這是「私領域」在「以生產為中心」的公私相嵌型結構下註定的命運——即使是在「私領域」得以彰顯的時刻。

三、職工家屬：明確的政治主體和受表彰的勞動

「家屬」作為正式的社會身份和政治主體，在1930年代的中華蘇維埃政權下就已存在了。在蘇維埃政權下，公民資格以勞動階級的身份為前提，而階級身份依據職業及其社會經濟地位來判斷。若以社會勞動來

44 賴若愚，〈應當加強職工家屬工作〉，《工人日報》，1957年6月3日，版1。

45 賴若愚，〈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賴若愚致詞〉(1957)；章蘊，〈勤儉建國 勤儉持家，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奮鬥〉，收入《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頁311、316。

46 賴若愚，〈貫徹「五好」勤儉持家 為社會主義服務 全國職工家屬代表會議開幕〉，《人民日報》，1957年6月5日，版1。

47 賴若愚，〈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賴若愚致詞〉，收入《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頁312。

確認每個人的社會身份，那麼，家庭婦女就不可能有自己獨立的社會身份，從而也無法成為國家的政治主體。所以，蘇維埃《憲法大綱》（1931年）承認「在蘇維埃政權領域內的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和他們的家屬」，皆為蘇維埃共和國的公民。何為家屬？蘇維埃的《選舉暫行條例》（1930）對「勞動者」和「家屬」的資格分別作了界定：「靠生產勞動或公益事業的服務而生活者，以及替他們管理家務者」。⁴⁸ 儘管《憲法大綱》和《選舉暫行條例》沒有明確指明家屬的性別，但是在當時的語境下，家務管理者只能是勞動階級的家庭主婦。另外，1933年10月10日通過的《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專門對地主、富農、資本家與工人、農民、貧農互婚、收養後，對通過婚姻和收養實行了階級流動的女子／小孩的階級成分如何確認作出了規定，並正式承認家務勞動是勞動。⁴⁹ 這可能是中共婦女解放理論上，第一次關於「家務勞動是勞動」的明確提法。蘇維埃政權通過承認家務是勞動和創造「家屬」這一獨特的社會身份，從而解決了家庭婦女無法依據社會職業來確定階級身份及其政治權利（選舉權）和經濟權利（分田）的問題。

1950年代城市中的家庭婦女，除了職工家屬，還有工商業者家屬、手工業者家屬，⁵⁰ 但是，獲得明確「工人階級」社會身份和政治地位的只有職工家屬，受到國家表彰和承認的勞動也只有職工家屬的家庭勞動，包括家內的家務勞動、鄰裡的家務互助和家外的副業勞動。換言之，只有對社會主義生產發揮作用的家務勞動才被國家承認。

48 廈門大學法律系、福建省檔案館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律文件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頁7、103。

49 韓延龍、常兆儒等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卷4，頁61-62。

50 為配合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3月29日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中國民主建國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共同召開了全國工商業者家屬和女工商業者代表會議。對工商業的家屬也指出「為社會主義作貢獻」的方向，包括：鼓勵自己的丈夫和親人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搞好家務教育好子女、自身養成愛勞動的習慣、積極參加社會活動等。其中「搞好家務，教育好子女，建立互助互勉，共同進步、團結和睦的家庭」被認為是工商業家屬「最直接的責任」。鄧穎超，〈跟著祖國前進，為社會主義貢獻力量〉，收入《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頁251-254。

第一，職工家屬是國家承認的一種社會身份。1954年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有147位女代表，瀋陽的職工家屬高鳳琴⁵¹就是以職工家屬的身份當選為人大代表的，這表明「職工家屬」在五〇年代的中國是一種可見的社會身份。1957年6月4日至6月12日召開了中國第一次全國職工家屬代表會議，全國各地的1,300多名職工家屬代表參加了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了會議代表。這種政治待遇與參加全國勞模大會的勞模的政治待遇相同。這種政治儀式傳達了國家對於家屬工作的重視，對職工家屬政治地位的承認，以及對家庭勞動的肯定。

第二，模範家屬是一種勞模類型。參加勞模大會，至今仍是一種崇高的政治榮譽和國家肯定的象徵。1956年的全國勞模代表大會，在《人民日報》上有名可查的模範家屬代表是，北京鐵路管理局北蜂窩職工家屬委員會主任孫瑞芝。1959年群英會（全國勞模大會）的參會代表中有特邀的模範家屬代表49人。⁵²女勞模作為生產領域的模範已被大家熟悉，但是，模範家屬——以性別化的家庭勞動為特徵的勞模——卻長期被學界和公眾所忽略。國家和公眾幾乎遺忘了曾經給予家務勞動和職工家屬的承認和榮譽。

1956年，為提前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全國總工會發出動員令，在全國召開先進生產者運動。為配合生產競賽，全國婦聯在職工家屬中普遍開展「五好」評選運動。全國各地評選出許多模範家屬——「五好」積極分子和「五好」家庭。武漢市當年出現了將近八萬個「五好」職工家庭；⁵³上海的上萬條里弄裡，在全市家庭婦女中評出「五好」積極分子9,100多名。⁵⁴1957年「勤儉建國、勤儉持家」方針

51 高鳳琴也是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

52 〈出席全國工業、交通運輸、基本建設、財貿方面社會主義建設先進集體和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代表名單 特邀代表〉，《人民日報》，1959年11月7日，版9。

53 〈婦聯組織深入職工家屬中開展「五好」運動 武漢出現近八萬個新家庭〉，《人民日報》，1956年11月18日，版4。

54 〈社會新風尚 家庭新氣象「五好」積極分子大批出現〉，《人民日報》，1956年12月5日，版4。

確立之後，全國婦聯曾短暫地把「五好」運動推向所有家庭婦女。

有必要指出的是，1956年和1959年勞模大會所表彰的職工家屬的勞動內容是不一樣的。1956年的模範家屬和「五好」評比，國家表彰的是職工家屬在家內的勞動，特別是家屬對男性職工的良好照顧間接促進企業的生產效率。以全國模範職工家屬高鳳琴為例，1953年宣傳的是高鳳琴組織家屬互助小組，在日常生活中提供家務互助、保證工人不因家事缺勤，以及鼓勵自己的丈夫和敦促其他家屬鼓勵其丈夫超額完成生產任務。⁵⁵ 在這段時間，儘管國家表彰的勞動仍是以家事為主和間接服務於生產為標準，但是國家表彰已顯露出對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互助的偏重。1959年，已進入「大躍進」時期，當時的重心是動員婦女走出家庭從事家庭外的生產勞動，家務勞動社會化的提法取代家務勞動光榮的說法，表彰婦女家內勞動的「五好」評選一度停止。1959年高鳳琴作為模範家屬參加「群英會」時，表彰的是她帶領職工家屬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大辦社辦工業，參加家庭外生產勞動。家屬們自籌資金和用舊廢料蓋起了廠房、食堂和托兒所，創辦了為大廠服務的11個簡易小工廠，包括紙袋子、五金、鑄造、水泥、木箱、紙盒、草袋子、縫紉等工廠。⁵⁶ 據報導，大躍進期間，高鳳琴所在的瀋陽市東北機器製造廠中有80%家屬參加了社會勞動，其中73%的家屬作為合同工（臨時工）參加國營工廠的生產勞動，27%的家屬加入到家屬自辦的社辦企業。⁵⁷ 群英會上，其他模範職工家屬的事蹟與高鳳琴類似，都是有關參加生產勞動、創辦社隊企業、支援國有大企業的生產。⁵⁸

在家屬的家內勞動與家外勞動的問題上，國家的態度在1956年下半年

55 中華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高鳳琴模範職工家屬小組〉，《人民日報》，1953年5月8日，版3。

56 〈從「鍋臺轉」到「機器轉」：高鳳琴代表談一個工廠職工家屬的大躍進〉（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發言），《人民日報》，1959年4月30日，版11。

57 〈瀋陽市前進人民公社在勝利前進 高鳳琴代表談東北機器製造廠是怎樣組織職工家屬生產和舉辦集體福利事業的〉，《人民日報》，1960年4月15日，版10。

58 〈保證職工生活好生產好 群英會職工家屬代表交流先進經驗〉，《人民日報》，1959年11月6日，版2。

年已悄然發生變化。1950年代前期以關注家屬個人的家內勞動為主，強調「必須照顧到她們家庭勞動的必要時間」，不能讓家屬積極分子在社會上兼職過多，以免影響她們家內責任的實現。⁵⁹ 1956年以後，開始鼓勵職工家屬從事家外勞動，而且這種組織起來的勞動具有集體性質。王政指出1950年代上海里弄工作，是家庭婦女傳統的生活服務角色擴展延伸到里弄，只是空間的擴展，工作內容沒有發生太多變化。⁶⁰ 雖是如此，但是這種勞動與傳統家內勞動的性質還是有本質區別的，區別就在於這種勞動是為集體服務的集體性勞動。

1956年除了繼續鼓勵社區內鄰里之間的家務互助，還出現了集中的副業生產。據報導，1954年職工家屬互助組全國有10,500個。⁶¹ 到1956年底，集中居住的職工家屬中，互助組迅速增加到37,972個，參加的職工家屬有45萬多人。⁶² 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一方面可能跟意識形態有關，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外，與農村的合作化運動一樣，組織起來的家屬勞動更能體現集體主義性質；另一方面是城市生活的實際需要，1956年下半年農村人口大量湧入城市。當時有兩個背景：一個是1956年農村實行高級合作社以後，一些農民以為土地被充公，紛紛進城投親靠友，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另一個是城市裡的一些工廠進行工資調整，青工的工資夠養家，從農村招工進城的青工通常會到老家找對象結婚，帶家屬進城。⁶³ 面對迅速膨脹的城市人口，《人民日報》甚至發文批評「農村人口脫離農業生產到城市去住著『當家屬』」是「逆流」。⁶⁴ 城

59 鄧穎超，〈四年來中國婦女運動的基本總結和今年任務〉；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關於今後全國婦女運動任務的決議〉，收入《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頁176、179。

60 王政，〈居委會的故事：社會性別與1950年代上海城市社會的重新組織〉，收入呂芳上編，《無聲之聲（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1600-1950）》，頁168。

61 〈全國二百多萬組織起來的職工家屬成為支援工業生產的重要力量〉，《人民日報》，1954年3月7日，版2。

62 楊之華，〈勤儉建國，勤儉持家 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更大的力量〉，《人民日報》，1957年6月5日，版3。

63 〈職工宿舍為什麼緊張？〉，《人民日報》，1957年11月19日，版3。

64 〈扭轉這股逆流（編後）〉，《人民日報》，1957年9月6日，版5。

市裡的住宅、交通、醫院等公用事業都趕不上需求，副食和基本生活服務設施的供應也出現了困難，特別是住房。⁶⁵ 1957年企業整風時，職工最集中的意見就是「要房難」。⁶⁶ 對於職工家庭而言，家屬進城、家庭規模的增大，單靠男性職工一個人的工資養家，將面臨生活困難。在社會主義企業中，救濟困難職工是生產單位的責任。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一個貧弱的基礎上大搞工業建設，依靠的是以高積累低消費的方式實現集體資金的快速積累。在大搞生產運動的1956年，企業不能也不想職工救濟方面花費更多的資金，必須依靠家屬自救。為了減輕企業的救濟壓力，1956年下半年，許多工廠的工會開始自發地組織職工家屬從事副業生產，以貼補職工家庭的收入。⁶⁷ 有的工廠甚至專門成立副業小組、副業生產委員會之類的領導機構來組織副業生產。⁶⁸ 1956年底至1957年初，政府開始有意識地從幾個方面著手解決這個問題：政治動員家屬返回農村、⁶⁹ 發佈一系列政策降低新錄用青工／學徒工工資和保障有薪休假探親⁷⁰ 以抑制工人帶家屬進城、鼓勵企業把留在城裡的家屬組織起

65 傅毅剛，〈為什麼若干城市在生活方面還有許多不便呢？〉，《人民日報》，1957年3月26日，版2。

66 孫光，〈不在城裡吃閒飯 回鄉做個種田人 北京國棉一廠職工家屬踴躍回農村〉，《人民日報》，1957年11月25日，版3。

67 〈改善職工生活的積極辦法——記西南萬山礦的家屬副業生產〉、〈許多職工家屬參加副業生產 家庭收入增加 生活困難解決〉，《工人日報》，1956年12月5日，版1；〈工會應該把這個工作抓起來〉，《工人日報》，1956年12月8日，版1。

68 〈工會應該把這個工作抓起來〉，《工人日報》，1956年12月8日，版1。

69 李廣發、王榮江，〈職工家屬還是回家鄉生產好〉，《人民日報》，1957年5月22日，版4；〈有計劃地疏散城市非生產人員 太原市已有六、七千人到農村去〉，《人民日報》，1957年8月16日，版4；〈勤儉建國從勤儉持家做起 朝陽縣財貿部門許多職工家屬回鄉生產〉，《人民日報》，1957年9月6日，版5；孫光，〈不在城裡吃閒飯 回鄉做個種田人 北京國棉一廠職工家屬踴躍回農村〉，《人民日報》，1957年11月25日，版3。

70 1957年11月16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八十五次會議批准了《國務院關於工人、職員退休處理的暫行規定》、《國務院關於企業、事業和國家機關中普通工和勤雜工的工資待遇的暫行規定》、《國務院關於國營、公私合營、合作社營、個體經營的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學徒的學習期限和生活補貼的暫行規定》、《國務院關於

來生產自救。⁷¹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城市裡的職工家屬被組織起來從事集體性的各類免費或有償的互助服務和副業生產。家屬社區內的互助，包括：集資建房、儲金互助，社區簡易托兒站、生病、接生互助等。⁷² 收入型的副業生產主要有三種類型，第一類是種菜養豬等農副業生產；第二類為洗衣縫紉等手工業生產；第三類則是在男性職工所在的企業中從事輔助生產，做一些簡單的原材料的整理和加工。截至1957年底，全國參加副業生產的職工家屬已達25萬多人。⁷³ 副業生產被認為是「解決了不少家庭臨時經濟上的困難」⁷⁴ 並「對個人和國家都有好處」。⁷⁵ 周恩來在1957年的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也稱職工家屬中的互助互濟工作是有成效、值得提倡和推廣舉辦社會福利事業的方法。⁷⁶

副業的開展使城市職工家屬的勞動從家內的家務勞動擴展到了家外的生產勞動，但副業生產被嚴格限定在「不能影響操持家務，不能影響職工生產」，此一限定乃是源於「如果因為搞副業，家屬便不管家務，

工人、職員回家探親的假期和工資待遇的暫行規定》。參見：《人民日報》，1957年11月17日，版1。

- 71 〈工會應該把這個工作抓起來〉，《工人日報》，1956年12月8日，版1；呂含英，〈職工家屬合作社〉，《人民日報》，1957年1月19日，版2；田工，〈組織職工家屬搞副業生產〉，《人民日報》，1957年2月19日，版2；吳榮江，〈大通煤礦是怎樣解決職工生活困難的〉，《人民日報》，1957年2月19日，版2；葛春，〈工人家庭的副業〉，《人民日報》，1957年4月27日，版3。
- 72 楊之華，〈勤儉建國，勤儉持家 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更大的力量〉（在全國職工家屬代表會議上的報告摘要），《人民日報》，1957年6月5日，版3。傅毅剛，〈為什麼若干城市在生活方面還有許多不便呢？〉，《人民日報》，1957年3月26日，版2；〈職工宿舍為什麼緊張？〉，《人民日報》，1957年11月19日，版3。
- 73 〈不比吃穿比勤勞 不比享受比儉樸 全國職工家屬勤成風儉成習〉，《人民日報》，1958年3月8日，版4。
- 74 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中國婦女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傳要點〉，收入《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頁301。
- 75 〈許多職工家屬參加副業生產 家庭收入增加 生活困難解決〉，《工人日報》，1956年12月5日，版1。
- 76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12/content_2081284.htm

職工回家不能按時吃飯，孩子無人照管，影響了出勤，那就是本末倒置」的想法。⁷⁷ 家庭外的副業生產被定位在為家庭貼補收入，屬於家庭勞動的範疇。屬於「家屬自救」的家庭副業，在大躍進期間迅速發展成為各類家屬工廠。大躍進期間，國家大力表彰家屬在家庭外的生產勞動，這種勞動不再具有家庭副業的性質，而是強調其社會生產的性質。家務勞動在國家話語中隱退，又變成了婦女解放的羈絆。但是，街道和農村中的食堂、托兒所等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僅持續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就宣告終結，家務勞動又重新回歸小家庭。

大躍進結束後，經濟進入調整時期，國家再次動員城市人口下鄉，支援農業和減少城市糧食的供應。國有企業大規模精減工人，被精減的工人分成兩類，一類是回（下）鄉⁷⁸ 支援農業，一類是回（城市）家從事家務。⁷⁹ 鞍鋼 1961 年和 1962 年兩年共精減職工 72,006 人，其中回到農村的 53,609 人，占 74.45%。⁸⁰ 截至 1962 年第 3 季度，鞍鋼還鄉家屬一共有 6,552 人。⁸¹ 不清楚的是，這些還鄉家屬是跟隨被精減的男職工回鄉，還是兩地分居式的回鄉。⁸² 大躍進期間新招進工廠的女工，特別是從農村招工進來的青年女工和以家屬身份招工進來的女工是首當其衝

77 〈工會應該把這個工作抓起來〉，《工人日報》，1956 年 12 月 8 日，版 1。

78 回鄉和下鄉是有區別的。回鄉一般指 1958 年以後從農村招工進城的工人，指回到原籍農村。下鄉指由組織安排城市人口「下放」到某一個指定鄉村。

79 〈鞍山鋼鐵公司工會女工部呈報黨委之報告〉（1961 年 9 月 6 日），鞍山鋼鐵公司檔案館，工會檔案，全宗 581 號／目錄 3.2 號／案卷 1 號，1961 年，頁 197-201。

80 《鞍鋼志 1916-1985》（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上卷，頁 75-76。

81 〈第三季度工作的基本總結和第四季度的工作安排〉（1962 年 10 月 11 日），鞍山鋼鐵公司檔案館，工會檔案，全宗 581 號／目錄 3.2 號／案卷 2 號，1962 年，頁 140。

82 從當時的政治輿論上看，存在著動員職工家屬返鄉的情形。參見：張學愚、範睦，〈江北煤礦做好思想組織工作分期分批動員大部職工家屬回鄉 減少脫離生產的消費者 增加創造財富的勞動者〉，《人民日報》，1964 年 7 月 27 日，版 1；〈職工家屬回鄉生產大有好處 —— 江北煤礦組織職工家屬回鄉參加勞動的重大意義（社論）〉，《人民日報》，1964 年 7 月 27 日，版 1；〈黨組織經常深入農村逐戶進行思想工作解決具體問題 新紙廠職工家屬安居農村積極勞動〉，《人民日報》，1964 年 8 月 23 日，版 3。

的精減對象，孩子多家庭負擔重的女工首先被動員回家從事家務。⁸³ 大躍進結束之後，全國女工數量銳減。1960年全民企業中的女工數量達到了1,008.7萬人，是中共建國到文革之前(1949-1965)的最高峰，1963年迅速下降到656.6萬人，三年精減女職工352.1萬人。⁸⁴ 一些精減下來的女工，若同時也是職工家屬，根據家庭的困難情況，由工會安排一些困難家庭的家屬進入家屬工廠。⁸⁵ 此時，工廠工會將家屬工作的重心重新回歸到「生產自救」，⁸⁶ 大量的職工家屬在丈夫所在的全民企業的家屬工廠裡工作，她們被稱作「家屬工」——一個介於「家屬」與「工人」之間模糊的身份。⁸⁷ 家屬工的勞動重新退縮到家庭副業的性質上，是工廠解決職工家庭困難的方式。婦聯的工作重心也從動員組織婦女參加社會生產重新轉移到對「勤儉建國、勤儉持家」的宣傳，並重新開展「五好」評比，肯定家務勞動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價值。一些工礦企業在家屬中舉辦「搞好家務保出勤」的競賽，⁸⁸ 一些城市街道重新評選「五好」，

83 〈形勢任務教育後女工思想動態〉(1961年8月26日)、〈鞍鋼女工部向工會黨委的報告〉(1961年9月6日)，鞍山鋼鐵公司檔案館，工會檔案，全宗581號／目錄3.2號／案卷1號，1961年，頁189-192、201。被訪人：紅姨，鞍鋼RB廠家屬工，時間：2011年5月28日，地點：鞍山紅姨家。

84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研究所、陝西省婦女聯合會研究室主編，《中國婦女統計資料1949-1989》，頁241。

85 鞍鋼下屬家屬廠RB廠的職工檔案。

86 〈關於耐火材料廠是怎樣解決當前職工生活問題的報告〉(1961年12月5日)，全宗581號／目錄3.2號／案卷1號，1961年，頁216；〈關於廠礦家屬生產自救有關生產組織、人數、工資計畫報表的通知〉(1962年5月29日)，鞍山鋼鐵公司檔案館，工會檔案，全宗581號／目錄3.2號／案卷2號，1962年，頁28。

87 根據鞍鋼工會在1963年3月14日發佈的〈鞍鋼職工家屬生產自救暫行辦法〉：「生產自救的性質，既不是全民所有制，也不是固定的集體所有制；既不是企業的組成部分，又不是企業的附屬單位；參加生產的職工家屬，不是職工，也不是就業。它是有領導的臨時性的群眾自願結合的勞動、經濟組織，個體的自負盈虧，個體的誰勞動誰得錢，有活就幹，無活就散」。鞍山鋼鐵公司檔案館，工會檔案，全宗581號／目錄3.2號／案卷4號，1963年，頁183。

88 〈重慶中梁山煤礦 配專職幹部做家屬工作〉，《人民日報》，1961年4月5日，版2。

只是評選標準中增加「政治掛帥思想好」⁸⁹的那個時期的烙印。但是，總體而言，對家務勞動表彰的強度和聲勢無法與 1950 年代前期相提並論，《人民日報》的報導頻率與 1957-1958 年上半年對「兩勤」方針的宣傳熱度相比，也是天壤之別。

四、女工農婦：作為「特殊困難」的家務勞動

在五、六〇年代，相比於國家高調地表彰職工家屬的家庭勞動，女工農婦的家務勞動在國家話語中的能見度就要小的多。對於女工和農婦，國家著力表彰的是她們在生產領域／公共領域中的表現，如勞動模範、先進生產工作者。

女工（女職工／女幹部也類似）在家庭內的責任——家務和照料孩子，被稱為「特殊困難」。言外之意，跟男性相比，這種困難是婦女所特有的。在公私相嵌型的集體主義生產體制下，解決這個困難的責任主體是生產單位。1956 年的全國先進生產者運動中，全國總工會對女工和家屬分別發出不同的號召。對女工，要求她們積極參加生產競賽；對於家屬，要求她們「保證職工得到充分的休息」。為此，總工會要求各基層工會「主動解決女工的特殊困難，辦好托兒所（站），做好兒童工作，使女工能夠減輕繁重的家務負擔，從事創造性的勞動」。⁹⁰「主動解決」的行動主體是工會，對「家屬工作」負組織領導責任的也是工會。工會是生產單位內部的一個職能部門。一方面說明在集體主義的生產體制中，生產單位對再生產領域的關注和責任，另一方面生產單位對女工和家屬的定位是不同的：女工首先是生產者，家屬是專職的家務承擔者。女工再生產職能的首要責任者是生產單位。關注生產單位提供給女工的勞動保障條件，比如，哺乳室、托兒所等設施的完善程度，轉移了對女

89 〈武漢街道婦女深入開展「五好」活動 勤儉建國 勤儉持家〉，《人民日報》，1962 年 1 月 19 日，版 3。

90 〈關於動員全國職工迎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展社會主義競賽，提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決議〉，《人民日報》，1956 年 2 月 29 日，版 5。

工家內負擔的關注。⁹¹ 但是，家務勞動的範圍遠遠大於和多於兒童養育、食堂這部分工作。在高積累低消費的社會裡，生活用品和服務設施普遍供應不足，家庭成員的衣食等生活消費品基本上依靠女性的無酬勞動。⁹² 在小家庭內部很大程度上保留著父權文化特徵的環境下，單位提供的部分福利遮蔽了女工／女職工在家內勞動方面事實上的負擔。在單位（國家）承諾與客觀需要之間的差距，縮簡成了女工個人的「特殊困難」：所謂「戀愛、結婚、生孩子」三道關，⁹³ 要求女工發揮革命意志加以克服。

1960年代，國有企業中出現了另一個很大的女工群體——家屬工，儘管國家至今不承認她們的工人身份。⁹⁴ 始於1956年下半年的家屬自救，家屬工作為企業內的臨時工長期存在。除了大躍進期間，國家強調家屬參加的生產勞動是社會勞動的性質，在七〇年代末期之前，家屬工參與的生產勞動，很大程度上看成是補貼家庭收入的家庭副業，是婦女家內責任的延伸。家屬工的「家屬」身份，使她們被視為家內勞動理所當所的承擔者，所以，她們的家務負擔完全排除在生產單位的責任之外。1960年代後期，因政治語境的變化，家屬工不再享有1950年代家屬曾經擁有過的光榮和承認，又因其夾縫中的尷尬身份亦無法享有女工的身份和待遇，包括工廠提供給全民女工的勞動保護待遇——特別是托兒機構、帶薪產假等。只有在集體積累達到一定程度時，一些家屬隊才建立

91 〈關於當前廠礦托兒所的情況和今後意見的報告〉（1961年8月29日），鞍山鋼鐵公司檔案館，工會檔案，全宗581號／目錄3.2號／案卷1號，1961年，頁185-188。

92 Elisabeth Croll, *Chinese Women since Mao* (London: Zed Books, 1983), p. 9.

93 這種提法從來不使用在男性身上。最典型的再現是勞模事蹟的官方材料，陳述男女勞模在生產領域內的表現時所使用的語言幾乎是相同的。唯一性別化的語言是常常會強調女勞模克服了「戀愛、婚姻、生孩子」三道關（即，三種困難）而取得生產領域內的成績。

94 1970年代末期，部分家屬工辦了臨時工轉正，成為了大集體工人。這部分工人可以領取集體工人的退休金。一些沒有轉正的家屬工，只領取企業發放的幾百元的退養金。所以，近十年來各地各國企的家屬工多有為爭取「工人」身份和退休金的抗爭。2009年以來，基於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一些地方政府開始實施家屬工、五七工養老保險辦法，以解決她們的養老問題。

起自己的互助型簡易托兒機構。⁹⁵ 家屬工甚至不能使用全民企業提供給全體工人的勞動條件，如通勤車、食堂、醫療⁹⁶ 等。托兒機構是國家提供給全民女工，為解決女工的「特殊困難」而建的設施。全民男工是不能享有這種待遇的，他們的家內責任和養兒育女的責任被認為已由專職的家屬承擔，儘管他們的家屬可能在家屬隊從事重體力勞動，⁹⁷ 只是這些勞動被看作為解決家庭困難而從事的家庭副業，這是家屬工的家內勞動被忽視的原因。

在家屬隊，要生孩子了就回去，懷孕六七個月就不留人了。許多家屬就藏著掖著，讓人看不出來，看出來就動員你回家了。甚至有的人怕人看見，就不洗澡。如果懷不顯，就多挺一段時間。生完了就回來，如果家屬不要求，也不會主動要你回來。（鞍鋼 RB 廠家屬工，DYX）

我們家屬隊曾經有一個人，一段時間每天吃一個自帶的茶雞蛋，大夥都覺得她家條件怎麼這麼好。後來才知道她流產了，4 天就來上班了。（鞍鋼 CJ 廠家屬工，張姨）

上班時，一個帶一個。小的怕他亂爬，栓在窗臺上，大的看著，坑上放點吃的……有條件的，雇一老太太看……一直到六幾年，家屬隊才成立自己的托兒所。（鞍鋼 CJ 廠家屬工，張姨）

需要承擔家內和家外兩種勞動的家屬工，只能利用一切可能的休息時間來做好家務活。甚至把一些手工活帶到工作場所，利用工餘時間來做。家屬工的處境與賀蕭所描述的陝西農村婦女夜間趕全家針線活的狀

95 2011 年筆者訪談了鞍鋼、大慶油田、中建某公司等十幾位家屬工，她們向我講述了家屬工與全民女工不同的勞保待遇。1960 年的〈勞動部等、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黨組關於女工勞動保護工作的報告〉、章蘊，〈關於當年婦女工作問題的報告〉從官方文件的角證實了這一情況的存在。參見：《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頁 406、147。

96 在全民企業中，職工家屬可憑家屬身份享受一些醫療待遇。

97 家屬工從事的工種多為無需技術的重體力勞動。筆者採訪的四家企業中的家屬工：一家是在建築工地做小工；一家是搬運整理廢鐵；一家是在堆積成小山的礦砂上面覆蓋和撒離稻草；一家是農副業田間勞動。

況非常相似。⁹⁸

每天三、四點多鐘起床，在地爐子上坐上水，做飯。先打點孩子，收拾家裡。完了，7點多鐘，走著上班，不管多遠，捨不得錢坐車呀。走20多分鐘，十裡地背著孩子，不能遲到，跑著去上班。下班就往家裡跑。打點睡下了，趕緊納鞋底、做棉襖。中午休息半小時，趕緊打麻繩（納鞋底用的）、織毛衣，夏天做夏天衣服。隊裡有一個老太太，頭開春就把一家人的棉衣都拆了，把布洗了，棉花重新絮上，把冬天的棉衣都做好了，活做的真好。那時，每家都四五個孩子，女的「不是人」呀……晚上，一個被窩摟兩個，前面一個吃奶的，後邊背一下，一晚上睡覺就像端手槍似的，胳膊都沒地方放。每天晚上十點十一點才能睡，一天才睡五六個小時。中午休息時，靠著就睡著了。（鞍鋼CJ廠家屬工，關姨）⁹⁹

相比於女工，家屬工可能承受著比女工還要沉重的兩種勞動的負擔。但在筆者所採訪的十幾位家屬工中，卻沒有聽到過，家屬工因為從事有酬的家外副業勞動而提高家內地位，或者丈夫分擔家務的故事。¹⁰⁰她們用「底子沒打好」來回答這類提問。幾次聽到家屬工用「臭家屬」來自稱，把男職工稱為「咱家上班的」，非常羨慕夫妻雙方都是全民職工的家庭，因為他們相互稱呼「咱家工友」。這些稱呼，生動地呈現出家屬工對於自身在生產領域和家庭領域中地位的體認。國家對於勞動的等級排序及所賦予其的不同價值和地位，已然深刻影響到了家內的性別關係。揉雜著傳統父權文化下的性別等級與新社會的勞動等級，再造了

98 Gail Hershtatter, "Making the Visible Invisible: The Fate of 'The Privat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收入呂芳上編,《無聲之聲(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1600-1950)》,頁273-276。

99 關姨有6個孩子,1962年進家屬隊。

100 在筆者的訪談中,年長的孩子分擔家務的故事屢見不鮮,但少有聽到丈夫分擔家事。妻子給出的解釋有兩種,一種是集體主義時期,經常號召職工利用休息時間搞會戰,特別是一些擔任領導和管理職位的男性,要與工人「同勞動」,節假日需要與工人一起加班加點。這也從另一個側面體現了集體主義時期的公私關係。另一種解釋是傳統的性別化分工,以及男的是「家裡主要掙錢的」。

一種集體主義時期的性別關係。

1950年代農村婦女的家務勞動在國家話語中的能見度和歷史變化性都要高於女工。合作化運動的初期，婦聯已看到隨著婦女廣泛地參加農業生產產生了生產勞動與家務勞動的矛盾。一方面婦聯認為不應該把婦女完全束縛在家務勞動上，應該「有條件地、逐漸地、適當地」解決這一矛盾；另一方面，婦聯認為必須在社會上展開教育，說明家務勞動、某些家庭手工勞動，在目前條件下也是社會不可缺少的勞動，以尋求對農村婦女家庭勞動的承認。1952年，對於孩子多、家務重的農村婦女，尚認為不應勉強要求她們過多的參加農業生產勞動。¹⁰¹

1955年下半年開始，全國農村開始進入合作化運動高潮，婦聯話語轉向對不積極吸收婦女參加農業生產，輕視婦女勞動力的批評。¹⁰²在此前提下，強調要「合理安排與使用婦女勞動力」、「應當根據發展生產的需要，婦女的生理特點和從事家務勞動的實際情況，對男女勞力實行統一計畫，分別安排」。¹⁰³生理特點和家務勞動被看作婦女勞動力內在的構成元素，「婦女勞動力的安排與使用，不僅要根據年齡和體力情況，而且要結合家務繁簡與孩子多少加以分類」。依據這一標準，把婦女的勞動力分成三類：年輕力壯家務很輕或無家務負擔的；身體一般或身強力壯有家務負擔的；家務負擔很重的。副業被認為是適合婦女身體和兼顧家務的實際情況、特別是對第二類和第三類婦女適合的勞動。參照城市職工家屬的經驗和家務勞動的理論，婦聯試圖賦予農村婦女的家務勞動以正當性，為其找到在農村集體勞動中的位置：

家務勞動不僅在過去是需要的，是輔助農業生產和為農業生

101 章蘊，〈關於當年婦女工作問題的報告〉，收入《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頁147。

102 〈全國婦聯為加強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婦女工作給各級婦聯的指示〉（1956年1月15日），收入《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頁235。

103 鄧穎超，〈進一步發揮婦女參加生產的積極性，保護婦女兒童的健康和安全〉；曹冠群，〈關於合理組織與使用婦女勞動力問題〉，收入《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頁257、272-275；〈合理地安排和使用農村婦女勞動力〉（社論），《人民日報》，1957年3月26日，版1。

產服務的，就是在高級合作化以後，家務勞動的重要意義也並沒有改變，……今天是輔助農業社的農業生產，是為集體農民——社員服務的了，應當說更有了新的意義。……家務勞動既然需要又是為社會主義生產服務的，而婦女從事家務操作又比男人更適合些，婦女擔負這種勞動也是光榮。農業社……必須留給婦女自由支配自己勞動的時間，以便料理家務和進行家庭副業生產。¹⁰⁴

儘管婦聯一度希望搬照城市職工家屬評選「五好」的做法，通過表揚家務做得好的家庭婦女，承認從事家務的農村婦女，但這種做法似乎遭到了反對。¹⁰⁵ 婦聯在套用同時期適用於城市職工家屬的家庭勞動理論來說服農村合作社接受家務勞動價值的時候，似乎沒有看到農村婦女不同於職工家屬的情況，即農村婦女必須參加農業生產掙工分，家庭男勞力的工分不足以支撐一家人的糧食需要。¹⁰⁶ 婦聯希望在承認家務勞動的前提下，在生產領域內分工分業，以解決婦女參加生產勞動和家務勞動之間的現實衝突。正如賀蕭所指出的，在實踐中，家務勞動和生產領域中的分工分業影響了婦女在生產領域內的報酬，使婦女成爲一種低價值的勞動力。人民公社化之後，事實存在著女社員的家務負擔與「追求男女都一樣」革命價值觀之間的緊張，甚至造成基層群眾與幹部之間的衝突。把這種衝突解釋成婦聯所宣導的「共產主義母性」(Marxist maternalist)與基層幹部信奉的革命平等觀念（革命的毛式倫理）兩種矛盾的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¹⁰⁷ 是不夠的。筆者認爲，衝突的根源在於以生產爲中心的政經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勞動力的評價（包括經濟評價和政治評價）

104 曹冠群，〈關於合理組織與使用婦女勞動力問題〉，收入《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頁 273。

105 曹冠群，〈關於合理組織與使用婦女勞動力問題〉，收入《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頁 275。

106 Gail Hershatter, "Making the Visible Invisible: The Fate of 'The Privat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收入呂芳上編，《無聲之聲(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1600-1950)》，頁 273。

107 Kimberley Manning, "The Gendered Politics of Woman-Work: Rethinking Radicalism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dern China* 32:3 (July 2006), pp. 349-384.

都是以生產領域內的表現為標準。作為有生產指標壓力的基層幹部（無論幹部的性別）故意忽略女性的「特殊困難」以追求生產目標，是一種可以理解的選擇。最終，在農村的集體生產中，婦聯領袖在 1950 年代中期所設想的三類農村婦女中，身強力壯沒有家務負擔的勞動者（其實絕大多數是未婚女青年）成為後來國家大力塑造的農村婦女解放的形象，比如六〇年代湧現出來的「鐵姑娘」。¹⁰⁸

1957 年 9 月第三次婦女全國代表大會「勤儉建國、勤儉持家」¹⁰⁹ 的婦運方針，實質上仍是「以生產為中心」，是毛澤東「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策略¹¹⁰ 的組成部分。「兩勤」方針不能僅看成具有歷史包袱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於傳統父權制文化的保留或是妥協——雖不能完全否定這一點。與其說妥協，不如說是利用。「兩勤」方針是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快速建設社會主義的一條捷徑，是廣大婦女服務於和捲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式。為趕英超美，國家一直努力想加快工業化建設步伐。在貧弱的

108 以往對集體主義時期「鐵姑娘」式婦女解放運動的無性化(unisex)——強體力勞動對於婦女生理特點的忽視——的批評，沒有看到這種「無性化」是生產領域內男女平等和家庭領域內性別化勞動分工共同產生的結果。另一佐證是家屬工從事的重體力勞動，也說明集體主義時期並不是以體力（生理上的差異）而是以婚姻和家庭所衍生的婦女家內責任作為性別化分工的基礎。

109 「兩勤」方針的詳細歷史過程參見：Wang Zheng, "Dilemmas of Inside Agitators: Chinese State Feminists in 1957," *The China Quarterly* 188 (December 2006), pp. 913-932. 王政的研究指出，全國婦聯在為第三次婦女全國代表大會起草工作報告的過程中，出現了婦聯的意願與黨的意志之間的衝突。前者希望突出男女平等，把「建設社會主義國家與實現男女完全平等並列」；後者希望婦聯工作服務於黨的中心工作，即，中共確立的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總任務。就本文的研究來看，這種衝突以及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欽定「兩勤」方針，都佐證了「勤儉持家」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性。

110 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之前，毛澤東已不滿意 1956 年反冒進以後不再提「多快好省」的口號。1957 年 10 月 9 日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閉幕會上，他指責 1956 年的反冒進掃掉了「多快好省」和農業發展綱要，提議恢復「多快好省」的口號。1957 年 12 月 12 日，毛澤東主持起草〈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並在《人民日報》上發表；1958 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乘風破浪〉的社論，再次提出「多快好省」，並增加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1949-1978)》（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卷 2，頁 464。

基礎上要快速實現工業化只能依靠「生產積累」和「勤儉積累」，這就是「多快好省」的具體化表現。1957年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1957年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即在生產領域中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一文中專闢一節談「關於節約」的問題，他回顧了從中共建國到1957年中共對節約與建設之間關係的認識過程及相應政策的演變，強調節約對於「一個經濟落後的窮國」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的重要性，並把「勤儉建國」作為建國方針提出來。¹¹¹同年7月，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中又提出：「農村中，勤儉持家應當和勤儉辦社並提，愛國、愛社應當和愛家並提。為瞭解決勤儉持家問題，特別要依靠婦女團體去做工作。」¹¹²「兩勤」方針就是在這樣一個時間點和歷史環境下出現的。由此可見，「兩勤」方針實際上是國家需要婦女在家庭領域中貫徹節約原則，為社會主義的高積累服務，而絕非僅為了個人和家庭致富：

國家生產的一切生活資料，很大部分是從家庭裡消費的，家庭能否節儉，也影響國家消費物資的供應情況。……能為國家節省出大批的消費物資，以緩和物資供應的緊張情況。……家庭裡如果能夠更進一步地作到積極開源，努力儲蓄，那就更能為國家增加建設的資金。……持家而能勤儉，就大大有助於整個國家的增產節約，就能使國家、集體同家庭利益更趨於一致。¹¹³

桃晏香是1958年上半年被國家大力宣傳的「雙勤」模範。婦聯對桃晏香事蹟宣傳的指導方針非常明確：重心在於「愛國愛社」，批評「孤立地搞勤儉持家、甚至脫離勤儉建國」、「只顧個人興家致富，忽視集

111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卷7，頁240。

112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冊6，頁546。

113 章蘊，〈勤儉建國 勤儉持家，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奮鬥〉，收入《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頁321。

體生產和社會勞動，忽視個人家庭的幸福和生活改善必須建築在集體富裕的基礎上，對發展生產也就不能起促進的作用」。¹¹⁴

「雙勤方針」無疑固化了對生產領域中的女工、農婦、家屬工的家內責任的要求：持家責任明確為婦女的「特殊責任」、¹¹⁵「家庭婦女要操持家務，參加社會勞動的婦女也要兼顧家務」。¹¹⁶ 桃晏香是寡婦，她必須承擔起家外生產勞動和家內的家務勞動，在國家宣傳的桃晏香的故事裡不存在兩種勞動的衝突，¹¹⁷ 但在實際生活中，兩種勞動的衝突無時不在。

農村婦女雖然擁有與城市全民女工同樣確定無疑的勞動者身份，不同的是，全民女工承擔的再生產職責作為勞動福利是以國家（全民企業是國家在生產領域中的具化）為責任主體，而人民公社裡農村婦女的社會福利（特別是托兒機構）在經歷了大躍進時期短暫的集體化之後，定位為「群眾自己的事業，辦不辦，怎樣辦，辦什麼樣子，要嚴格遵守由群眾作主，群眾自願參加的原則」。¹¹⁸ 全民工廠裡的家屬工與人民公社裡的農村婦女處境相似，缺少國家提供的保障性勞動福利。在集體積累很低的年代，「家務勞動社會化」的實現被推遲了。在意識形態上，「婦女的特殊困難」視為婦女所特有時，再生產領域的職責很大程度上個人化和婦女化（並非家庭化，家庭裡的男性勞動者的主要責任仍是參加生產勞動），婦女被要求發揮個人的革命意志將其克服。這種意識形態的建構非常有利於「以生產為中心」的大生產體制，代價是故意無視婦女家內勞動的負擔。

114 〈全國婦聯關於 1958 年 1 月召開的省（市）、自治區婦聯主任會議的通報〉，收入《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頁 353、355。

115 蔡暢，〈中國婦女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收入《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頁 305。

116 章蘊，〈勤儉建國 勤儉持家，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奮鬥〉，收入《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頁 321。

117 陳毅，〈介紹晏桃香的勞動事蹟（詩）〉，《中國婦女》，期 101（1958 年 3 月），頁 4-6。

118 〈全國婦聯黨組關於農村托兒組織問題的請示報告〉（1961 年 6 月 29 日），收入《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頁 411。

五、崇公抑私：家務勞動在國家話語中的消失

1960年代初期，經濟進入調整時期，對於家內勞動的國家話語也退回到大躍進之前。對家務勞動的表揚雖沒有1950年代中期彰顯，卻也沒有完全從國家話語中消失。1963年《人民日報》的「三八」社論〈婦女們，為爭取新的勝利而鬥爭〉，仍在號召城市家庭婦女和職工家屬們要進一步發揚為生產和為群眾服務的精神，把自己的家務勞動做好，保證職工們精力充沛地投入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中。奇怪的是，1964年以後有關家務勞動的話語在《人民日報》中突然消失了。1964年三八社論¹¹⁹的話語明顯「革命化」，「革命」一詞在全文中出現了14次。強調「在婦女群眾中廣泛樹立社會主義新思想、新道德、新風尚」是當前婦女工作的中心內容，也是根本環節。那麼，「革命」的具體所指是什麼？什麼是「社會主義新思想、新道德、新風尚」？

1965年三八節前夕，全國婦聯對職工家屬和街道勞動婦女發出的號召是「支援職工搞好生產建設，並根據國家和人民群眾的需要，參加生產和服務性勞動，積極支援社會主義建設」，隻字未提家務勞動。¹²⁰但是，家屬及其勞動並沒有從國家話語中消失，只是國家表彰的是家屬從事的集體化的生產勞動。1960年代中期，模範家屬的典型是從事集體農副業生產的大慶家屬。¹²¹1966年三八節前夕，表現大慶家屬的六幕話劇「初升的太陽」初次晉京演出，¹²²《人民日報》隨之集中報導了大慶油

119 〈婦女們，發揚革命精神爭取新的勝利〉，《人民日報》，1964年3月8日，版2。

120 〈全國婦聯向各級婦聯發出關於紀念「三八」節的通知 號召婦女大樹革命雄心苦練過硬本領 在革命和建設高潮中作出更大貢獻〉，《人民日報》，1965年2月19日，版2。

121 1960年大慶油田會戰開始，幾萬人一下子集中到只有零星村屯的北大荒。當時國家遭遇自然災害，一方面對石油工人的物資供應非常緊張，會戰職工糧食不夠吃，不得不自力更生開荒種地。另一方面，來自全國各地的家屬因災荒紛紛跑到大慶投奔職工。1962年9月，大慶油田會戰工委開始把家屬組織起來參加農副業的生產。

122 藝兵，〈廠礦職工家屬的一面旗幟——漫談「初升的太陽」〉，《人民日報》，1966

田的職工家屬，大力表揚大慶職工家屬「勞動化、集體化、革命化」。¹²³「初升的太陽」的主題歌是〈大慶家屬鬧革命〉，大慶家屬模範薛桂芳被稱為「大慶家屬革命化的標兵」。「革命化」的內在要求是思想上要有「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¹²⁴以及「愛的是勞動，想的是集體，幹的是革命」的「無產階級的世界觀」。¹²⁵「革命化」的外在表現是參加集體的生產勞動。「革命化」的思想是為「革命化」的行動服務，最終目的是服務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本質仍是以「以生產為中心」。

那麼，為什麼 1964 年出現了崇公抑私的「革命化」轉向？這種「革命化」為什麼會使家內勞動在國家話語中徹底消失呢？

大躍進結束之後，一些地方出現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到戶的情況，中共黨內也出現了一些支持包產到戶的聲音。毛澤東把「單幹」看成是與「集體化」的社會主義道路相對抗的資本主義道路。於是，在 1962 年 9 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以批「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在這種語境下，毛澤東的「階級」話語表達的是對集體主義生產方式的捍衛。「大公無私」不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也是對一種經濟體制、生產方式的表達。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後，一些地方進行了整風整社和社會主義教育。1963 年城鄉社會主義教育全面鋪開，在意識形態領域展開對修正主義的批判。¹²⁶ 1964 年強調「革命化」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的三八社論，就是誕生於這樣一個政治背景之下。生產方式之爭，必然深刻影響到國家所支持的婦女勞動形式。以「大公無私」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為標準，只有集體化的婦女勞動才是革命化

年 3 月 7 日，版 6。

123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 組織起來參加生產勞動 大慶家屬鍛煉成革命化的勞動 她們在三大革命運動中煉紅了思想，學會了本領，為油田建設作出巨大貢獻〉，《人民日報》，1966 年 3 月 3 日，版 1。

124 田愛珍，〈我的思想革命和我的家庭革命〉，《人民日報》，1966 年 3 月 7 日，版 2。

125 楊浦，〈「家屬」新論〉，《人民日報》，1966 年 3 月 10 日，版 6。

126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1949-1978)》，下冊，頁 710-731。

的。家庭副業具有「單幹」性質被否定，家務勞動因具有「私性」被抑制，最終表現為在國家話語層面上的「消失」。

1964年10月，《紅旗》雜誌第20期刊登署名萬木春的文章——〈怎樣看待婦女問題〉，10月28日《人民日報》轉載該文。¹²⁷ 文中以「階級」（代表著「公」）之名把家庭及性別關係作為「私」加以批評。在大公無私的結構下，私領域不再具有正當性；家庭勞動以及與性別相關議題的討論作為「私」不再具有政治合法性。萬木春批評《中國婦女》1963年前後組織的兩次爭論「女人活著為什麼」、「選擇愛人的標準是什麼」傳播了「錯誤思想和糊塗觀念」，並指出從性別上看婦女問題，割裂婦女解放與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聯繫，是資產階級的「婦女觀點」。萬文認為，一些女幹部把工作與家務安排問題作為「女人活著為什麼」的問題提出來是不恰當的。萬木春認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首先是有沒有獻身於無產階級事業的堅定意志和決心的問題」，作為一個「革命女幹部，要使自己成為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行動上「她就會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貢獻給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也就會正確地處理革命工作與個人問題的關係」。在萬木春「大公無私」的革命標準下，革命工作與家庭責任的衝突不是一個需要選擇的問題，答案是明確唯一的。而《中國婦女》的討論只會「向婦女散佈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經常用『家庭幸福』等等問題轉移她們的注意力，敗壞勞動婦女的社會主義意識，戕害她們的革命意志，使她們朝著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方向墮落下去」。萬木春理想的目標是「要鼓勵婦女們參加一切社會生活和社會活動，這樣她們才能拋棄自己那種狹窄的個人主義家庭生活和心理的限制」。可見，隱藏在「階級」話語壓倒「性別」話語¹²⁸ 背後的邏輯，是希望調動個人的主觀積極性、以「大公無私」的熱情集合階級全體之力實現無產

127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兩報一刊在五、六〇年代的中國政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作為黨的喉舌，代表黨內最高層的政治態度，起著政治風象標的作用。萬木春的文章在《紅旗》發表，並被《人民日報》轉載，是一個非同小可的政治事件和重要的政治信號。

128 感謝王政教授惠寄她的未刊稿“*When ‘Class’ Intersected Gender in 1964*”，該文認為萬木春一文標誌著階級話語從此壓倒了性別話語。

階級的革命事業。結合以階級話語言說的兩條路線之爭，實質上仍是源於想快速實現現代化的焦慮產生「公」對「私」的擠壓。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五、六〇年代的女工、農婦、家屬工事實上都存在著家外勞動與家內勞動的雙重負擔。女幹部處境也相似。女幹部不同於女工農婦家屬工的是，她們能夠言說並表達雙重負擔的困境。1963年，《中國婦女》雜誌第4期基於對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區夢覺的訪談，發表了一篇題為〈談革命婦女的人生觀〉，《中國婦女》雜誌編輯部配合該文發表了〈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的評論文章。兩篇文章的主要觀點是要求婦女幹部把革命事業放在第一位，個人生活（家庭、孩子）放第二位。兩篇文章發表之後，編輯部收到來自全國19個省市2,000多封讀者來信和稿件，《中國婦女》雜誌刊登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幾十篇文章，對這個問題展開了大半年的討論。這場討論就是萬木春點名批評的兩場討論之一。1964年，《中國婦女》雜誌在第2期發表〈決心做堅強的徹底的革命女戰士〉，作為這次討論的總結。對貪圖「小家庭的溫暖」，只顧個人享受的思想進行了批評；面對革命工作與家務矛盾，則要求婦女幹部毫不猶豫地把革命利益和革命事業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精神解決實際困難」。¹²⁹

表面上看，萬木春一文與《中國婦女》的觀點沒有實質區別，都強調革命第一，家庭第二。為什麼萬木春要如此嚴厲地批評《中國婦女》呢？這是因為兩者之間存在著潛在的卻是本質的區別：第一，《中國婦女》雜誌並沒有完全放棄對性別問題的關注，只是將其排序於第二位。第二，《中國婦女》認為解決兩重負擔的最終責任主體是國家和對家庭內性別關係的重構。《中國婦女》為解決兩重負擔開出的方子是依靠集體福利事業、實行計劃生育、不要嬌慣孩子、夫妻之間的家務分工；而萬木春把問題的解決完全推給了婦女個人及其革命意志。從公私結構的角度來看，《中國婦女》延續著1950年代公私相嵌型的結構，對婦女雙重負擔的討論是以此結構為起點的。「私」雖處於第二位，但仍為其保

129 〈決心做堅強的徹底的革命女戰士〉，《中國婦女》，期202（1964年2月），頁8-15。

留了位置，所以可以在為「公」的名義下討論「私」。在萬木春「大公無私」的結構裡，「公」完全吞併「私」，大「公」而無「私」。家內勞動和性別關係作為「私」是完全沒有位置的，需要用革命意志來抑制和克服。要「公」還是要「私」，已成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崇公抑私」與「興無滅資」在語詞結構上是完全對應的：公／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社會 V.S. 私／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社會。早在 1964 年的三八節社論中，已把「社會主義新思想、新道德、新風尚」概括為「興無滅資，移風易俗」。在「社會主義新思想、新道德、新風尚」中還特別提到「用革命的態度來對待戀愛、婚姻和家庭問題」。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婦女》作為中共體制內女權思想的陣地，沒有及時的「移風易俗」，跟上中國政治風向的轉移，適應大公無私的結構性轉型。萬文的批判文章，實質上是中共最高層對於「遲鈍」的婦運及婦運領袖的一個嚴厲的政治信號。萬文發表後不久，《中國婦女》不得不在該雜誌第 11 期轉載萬文並公開表態，但一時不明就裡、不知為何被批判的《中國婦女》雜誌只好統籠地稱「用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分析的方法來看待婦女問題是完全正確的」。1966 年文革開始之後，《中國婦女》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董邊被撤銷職務，這兩場討論成為她的「罪證」。

萬木春一文可以說昭示了後來中國政治的走向：崇公抑私、大公無私的提法成為意識形態主流，「狠鬥私心一閃念」成為革命化的要求和每個人需要自省的標準。文革中，「勤儉持家」被批判為「謀一家一戶的私利而精打細算，以瓦解婦女群眾的革命意志，使婦女工作圍繞著資產階級的『私』字打轉轉」。¹³⁰ 有意思的是，文革中，上海服務行業的女性臨時工也曾經挪用革命的意識形態，試圖挑戰「半家務、半勞動」的臨時工制度，理由是「它束縛了我們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積極性」，

130 全國婦聯無產階級革命派，〈勞動婦女堅決走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徹底批判中國赫魯雪夫反革命修正主義婦女運動路線〉，《人民日報》，1968 年 3 月 17 日，版 4。

要求做全天工。¹³¹

「大公無私」是公私相嵌型結構的極端，家內勞動在這個結構下徹底被擠出國家視域。現實生活中，家務勞動仍然存在著並主要由婦女承擔，參加生產勞動作為婦女解放的標準，婦女兩種勞動的緊張卻無從消解。

六、結 語

集體主義時期高積累低消費的工業化發展是一種性別化的經濟發展策略，不僅體現在生產領域和再生產領域的性別化分工，同時也體現在男工女農的性別化分業上。¹³²「以生產為中心」的集體主義大生產體制，有意識地維持了父權制家庭遺留下來的家庭模式，把性別化分工編織進大生產體制，由婦女無酬承擔起絕大部分的再生產職責。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把前三十年的工業化積累，歸功於集體主義的大生產體制，那麼，這種工業化成就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性別化的分工和由婦女無酬承擔的再生產職能——而且這種勞動曾經獲得國家的承認和表彰。¹³³ 如果說，集體主義時期家庭領域內性別化分工的刻意保留，只是特定歷史階段追求經濟發展的妥協性策略，那麼，在市場化轉型的今天，這一妥協性政策卻使婦女成為市場條件下「劣等」的廉價勞動力。我們看到這兩種經濟體制之間的歷史延續性。正是集體主義時期對於婦女家內責任

131 〈打垮「半家務、半勞動」的舊制度，三八戰鬥隊砸碎「奴隸」的枷鎖〉，《紅色工人》（1967年2月16日），頁2。

132 集體主義時期，男工女農有兩種模式：一種模式是空間分離的男工女農，即男職工在城市工廠，女性家屬回鄉勞動。五〇年代快速工業化使城市人口急速膨脹，既有的城市設施無法負擔全部城市人口時，1956-1957、1961-1963年都發生過大規模動員城市職工家屬回鄉參加農村生產建設的運動。另一種模式是同一個空間內的男工女農，即在同一個生產單位內男工女農的分業形式。在副食緊缺的五、六〇年代，許多城市的全民工礦企業，建起附屬農場。許多女性家屬工參加企業組織的集體農業生產。

133 Elisabeth Croll, *Chinese Women since Mao*, p. 9.

的刻意保留，使國家在鮮有抵抗的情況從與再生產有關的福利供給中撤離並順利地實現了市場經濟的轉型。如同王政指出，計劃經濟時期婦女承擔的再生產勞動和性別化的分工是市場化改革時女工下崗的前提。¹³⁴

但是，筆者仍認為在集體主義的政經結構裡，原本可以探索一種有別於資本主義大生產體系的另類現代性，建立起以人為中心、公私相嵌、統籌生產和生活的生產體制。只是在一個急迫地想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新興社會主義國家裡，在「以生產為中心」的驅動下，追求經濟超速發展的欲望，推遲了兌現家務勞動社會化的國家承諾，產生對「大公無私」的集體主義生產方式的過快追求，迫使「公領域」越來越擠壓「私領域」，直至「私領域」無處存身。從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期，家庭勞動在國家話語中從彰顯到消失的過程就是「私領域」逐漸被「公領域」擠壓的過程。

如果說，在社會主義的理想圖景中，再生產職能原本應該通過社會化來解決，家庭逐漸演變為一個徹底的情感組織，不再具有經濟功能，那麼，市場化轉型以後的中國大陸，在公私分離的結構下，家庭被自然化、道德化和固化，婦女的家內責任被自然化、甚至被美化。如果說，在集體主義時期，還保留著對婦女解放未來圖景的承諾和可能的解放路線圖，婦女的奉獻是以共同發展的承諾和未來的改善為擔保的，¹³⁵ 那麼，在市場化的今天，缺失了未來解放圖景的婦女，日益陷入在消費主義的泥潭中，尋求迷失的主體，國家責任消解於公私分離和崇尚個人責任的新自由主義的帷幕之下。

134 Wang Zheng, "Gender, Employment and Women's Resistance,"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Second Edition: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158-182.

135 Elisabeth Croll 指出，以長期利益為期許的婦女短期利益的受損，存在著形成一個制度化習慣的危險，並使婦女的無酬勞動持續地無期限地資助國家經濟。此話不幸被言中。某種意義上，集體主義時期和市場化時期，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都建立在婦女家內的無酬勞動之上的，不僅被制度化，而且獲得了集體主義意識形態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一致支持。

The Private Embedded in the Public: The State's Discourse on Domestic Work, 1949-1966

Shao-peng Song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collectivizat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obsessed with the speed of production, devoted to interests of "public," and suffering from shortages of supplies and services, and thus the private sphere withered. Domestic work was regarded as less and less important. At the same time, the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r was preserved and woven into the production system. People thus hardly noticed when the state was almost completely withdrawn from areas related to production and domestic work in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era that followed. Now the state does not even claim any responsibilities in this area, which has become largely privatized. The long process leading to this outcom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socialist period.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is process affected three groups of women: female workers, peasant women, and housewives (*jiashu*)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heir chang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oduction system determined the state's attitudes to their domestic work and their political status. In the 1950s, domestic work was not completely invisible in the state's discourse. On the contrary, the state tried to theorize domestic work, and place it in the appropriate position within the socialist production system. As their domestic work was recognized as work, *jiashu* achieved soci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status in the state's discourse precisely through their domestic work. The state recognized their domestic work as at least an indirect

contribution to production and praised those who excelled in domestic work as model *jiashu*. However, the significance of domestic work changed over time in the state's discourse. Peasant women and female workers were given explicit identities as laborers with a duty to work in the formal production sphere. Still, peasant women's identity as laborers was linked to the domestic work—under the high-accumulation and low-consumption of the collective production system, the responsibilities for reproduction were undertaken by individuals rather than the cooperatives. Domestic responsibilities thus made women a second-class workforce in the work-point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cities, work units were responsible for issues related to female worker's reproduction. Consequently, the stat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ir domestic work, but due to the shortage in household items and service facilities, female workers had to shoulder many domestic responsibilities, such as cooking and making clothes and the like. Thus, “special difficulties” arose that female workers had to overcome themselves.

Key Words: private embedded in public, domestic work, state discourse, collectivism, production-centered development strategy